

中国 经济的波动与调整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研究

郑家亨 章钟基 邱晓华 谢鸿光 著
郑京平 刘秋生 贺剑敏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经济的波动与调整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研究

郑家亨 章钟基 邱晓华 谢鸿光 著
郑京平 刘秋生 贺剑敏



中财 B0032269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藏书章

总号 408712

书号

中国统计出版社

(京)新登字 041 号

中国经济的波动与调整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研究

郑家亨 章钟基 邱晓华 谢鸿光 著
郑京平 刘秋生 贺剑敏

S1700A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北京三里河月坛南街 38 号 100826)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交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625 印张 20 万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7-5037-0726-7 / F·362

定价: 12.00 元

CD24/32

前 言

避免经济的大波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也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重要课题。

建国4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经济运行轨迹也鲜明地呈现出三次大的波动，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弄清这三次经济大波动的成因，对今后科学地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成立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研究》课题组，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研究。本研究课题被批准列入国家“七五”社科重大课题，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本课题由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高级经济师郑家亨同志主持研究。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研究报告的第一、二、三部分分别由郑京平、贺剑敏、刘秋生同志执笔，邱晓华同志总纂，章钟基、谢鸿光同志修改，最后由郑家亨同志审核定稿。在本课题研究中，得到了刘国光、李朋、孙尚清、董辅祁等同志的指导，特此致谢。

本书是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研究》
课题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中
国统计出版社给予了大力支持，深表感谢。

作 者

1992年2月10日

目 录

导言	(1)
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的三次大波动与调整	(4)
一、经济波动与调整：问题的提出	(4)
二、“大跃进”：中国的第一次经济大波动与调整	(6)
三、“文化大革命”与“洋跃进”：中国的第二次经济 大波动与调整	(11)
四、改革中的起伏：中国的第三次经济 大波动与调整	(17)
第二部分 中国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的原因探析	(26)
一、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非均衡发展：我国经济发展 大起大落的直接经济原因	(26)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影响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发展 的重要因素	(35)
三、低效率：影响国民经济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47)
四、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加剧国民经济的波动	(54)
五、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 影响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60)
第三部分 对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 发展的政策建议	(73)
一、正确认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73)
二、必须选择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	(76)

三、坚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政策 (77)

四、制定正确的需求管理政策 (81)

五、科学地调控社会总供求，保持二者的基本平衡
和适度增长 (87)

六、构造合理的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 (89)

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健全法制，搞好廉政建设，
调动全国上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91)

附录一：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指标 (92)

附录二：宏观经济监测与预警系统简介 (182)

附录三：专家审评意见 (232)

导 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辛努力，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巨大业绩，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正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回顾历史，既有成功的喜悦、探索的艰辛，也有失败的磨难。在共和国的发展进程中，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剧烈频繁的波动，使有限的资源浪费巨大，经济发展的效益不高，投入与产出比例极不协调。

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剧烈的波动？这种剧烈的波动，是社会化大生产中供求规律变化的一种共有现象，还是一种“外在力量”所致？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缺陷，还是宏观政策取向上的偏差？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索的课题。

为此，我们运用实证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选取了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最有影响的三次大的波动与调整，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经济运行状况作一深入的透视，进行多侧面的研究，以期找出导致经济较大波动的原因，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借鉴。

本研究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中国经济的三次大波动与

调整；（二）中国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的原因探析；（三）对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我们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是利益机制。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下，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和各自的利益必然产生各种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变化推动着经济的周而复始的进行。

2、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一般性波动，是各种事物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客观上有其必然性，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可能避免周期性危机。过去之所以出现较大波动，则是主观背离客观，脱离国情搞建设，急于求成，使矛盾运动发生意外偏离的结果，没有客观必然性。

3、中国经济波动具有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特征，即供求失衡推动结构失调，进而导致经济的波动，随之被迫进行调整。

4、中国经济波动有其特殊性，即它受各种政治因素影响的程度比其他国家要大。

5、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脱节，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很不完善，加上宏观决策上的偏差，造成宏观调控科学依据不充分，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也使得微观缺乏内在自求均衡的属性，放大了中国经济波动的程度。

6、中国经济波动随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历史演变表现出不同的特征：80年代以前，主要是高度集权下的以产业结构重型化为特征的投资扩张，形成资源强约束下的经济运行的波动；80年代以来，则主要表现为行政分权下的以投资、消费“双向扩张”，形成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下的经济运行的波动。

7、经济波动是经济调整之因，经济大波动必然引致经济大调整，要避免大调整必先防止大波动。

8、要缩小经济运行波动的波幅与频率，必须从指导思想上

解决脱离国情的急于求成的痼疾，选择适当的经济发展战略，制定适宜的社会供给与需求总量和结构政策，还要进行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改革要以有计划商品经济为目标，兼取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两者之长，使资源配置实现优化。改革要从推进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与微观行为规范两方面入手，前者逐步做到科学、有效、及时，后者逐步做到活而有序。改革的基本前提在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便为宏观、微观两方面的改革创造一个必要的空间。只有在体制合理、政策得当、调控科学的基础上，才能推动国民经济在质的不断提高中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的

三次大波动与调整

一、经济波动与调整：问题的提出

经济波动，一般是指经济运行过程中交替出现的扩张和收缩、繁荣与萧条、高涨与衰退现象。

经济波动大都由一个经济扩张期和接下来的收缩期（或说经济调整期）构成。并用“峰顶”和“谷底”分别表示两个阶段的转折点。追溯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早期的经济运行轨迹呈现极不稳定的趋势。由于自然灾害、疾病、战乱频繁，而科学技术水平、人们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较低等原因，经常出现经济绝对下降的情况。所以，当时人们往往把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理解为经济的绝对升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飞速进步，人们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显著提高，加之政府纷纷采取宏观财政、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生活，多数国家经济运行出现的波动相对缓和，经济绝对下降的年份已不多见。伴随着这一变化，人们对经济波动的含义有了新的认识与理解。这就是：经济波动主要是指经济运行中经济增长率的升降，而不是指增长方向的逆转。按照这种定义，在扩张期，经济增长率呈上升的趋势；而在收缩期，经济增长率呈相对下降的趋势，负增长则毫不例外地都划在经济收缩

期内。

经济波动的成因十分复杂，从总体而言，经济波动总是由经济总量是否平衡和经济结构是否协调所决定的。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经济波动主要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所伴生的生产盲目性和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以及由此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并存。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波动通常主要表现为需求扩张所引发的供求总量失衡，以及生产结构赶不上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构性失衡。

一般说来，经济波动是经济领域客观事物运动的必然表现，无论是何种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因此，如何避免经济的大波动，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一直是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在宏观调控与决策中优先考虑的课题之一。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而言，应该能够避免经济的较大波动。但纵观我国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却可以发现，虽然国民经济总的发展趋势是增长，但却呈现出明显的波浪式。最为突出的是 50 年代末期、70 年代末期和 80 年中后期的三次大波动。即 1958 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和 1961—1965 年的经济大调整。1966 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1978 年的“洋跃进”和 1979—1983 年的经济大调整。1984—1988 年间高度通货膨胀和 1988 年至现在的治理整顿（实质上是第三次经济大调整）。

选取这三次最突出、最典型的大波动与调整进行剖析，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国民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认识。这是因为：

（1）这三次大波动与调整在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历程中引起的震动极为强烈。

（2）这三次大波动后的调整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广泛重视。三次调整均有明确的方针，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付诸实施的。

(3) 这三次大波动与调整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第一次经济大波动与调整处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第二次经济大波动与调整处在社会动荡和对外开放的启动时期；第三次经济大波动和调整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正在建立过程中。这使我们全面地认识我国不同经济模式下，经济波动的不同表现特征和原因是有利的。

二、“大跃进”：中国的第一次 经济大波动与调整

(一) 巨大的压力与强烈的愿望：历史背景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面对经过战乱蹂躏、满目疮痍、非常衰弱的经济，新中国的主人很快就发现，建设新中国的任务依然很重。

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固定资产仅100多亿元，生产技术水平极端落后，原始的采掘业和修修补补的工场手工业占40%以上。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物价暴涨，大量劳动力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解决占世界1/5人口的温饱和尽快实现工业化两大问题尖锐地摆在党和政府面前，构成了巨大的内部压力。

与此同时，新中国一成立，即处在经济实力上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美国出于侵略扩张和扼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我国实行了严厉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政策；并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方面向我直接进行军事挑衅。西方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对我国也采取了不承认的态度，形成了巨大的外部压力。

此外，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广大人民群众，由于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有一股冲天的革命热情和强烈的除旧立新愿望，恨不能立即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构成了一种强烈的改变落后现状的建设欲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全中国人民的辛勤努力，我们坚决顶住了国外敌对势力军事上的威胁挑衅，政治上的孤立遏制，经济上的封锁禁运。在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同时，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胜利完成了艰巨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到1952年，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中，绝大部分超过了建国前最高水平。3年平均，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21.1%。并且从根本上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

紧接着，我们在苏联的大力帮助下，开始实行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在此期间，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重要建设项目，有135个已经施工建设，有68个全部建成投产或部分投产，为我国工业化进程建立了初步基础。五年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8.9%；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也都超额完成计划。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也有相当改善，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递增4.2%。

“一五”期间，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也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原计划用1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合作化道路等，在3—4年内就完成了。生产关系的这一迅速变化，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但从中国的实际来衡量，这种过急、过纯的所有制改革，也给以后的生产力发展留下了不利影响。

（二）“大跃进”：演变过程与经济影响

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但与此同时，也使一些领导同志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思想，人的主观意识被夸大了，急躁冒进的指导思想开始

抬头。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形成，为这种思想见诸行动提供了条件。致使 1957 年冬和 1958 年初出现了一系列的行动偏差。造成经济建设脱离了国情，违背了客观规律。在 7 年超英，15 年赶美等不切实际的“要求”推动下，在“一天等于 20 年”的设想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一些原则被扭曲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实际成为只讲“多快”，忽视“好省”；“大跃进”实际成为高指标、浮夸风。加之以钢为纲，千军万马保“钢铁元帅”，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一些“天方夜谭”式的数字随处可见。

在经济建设“大跃进”的同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来了个“大跃进”。1958 年 8 月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随后在较短的时间中就在全中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使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大大超前于当时的农村生产力。三年“大跃进”，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实事求是、夸大主观意识的浮夸风、共产风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一是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随意修订国民经济计划，使计划工作失去了严肃性和权威性。二是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进行生产关系变革，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三是使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失衡、比例失调、资源破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由此使国民经济运行出现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大波动。从第一次大波动的表现特征看，主要可以归结为：一是生产关系变革的超前，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二是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导致了农轻重比例的失调；三是高积累引发的需求扩张超过了社会供给的可能；四是引发这次经济大波动的深层动力主要来自宏观决策的偏差。

（三）紧缩：中国经济的第一次大调整

大波动之后必然带来大调整。“大跃进”带来的严酷事实迫使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大调整。

1960 年 9 月底，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关于 1961 年国民经

济控制数字的报告》时，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此后，一系列重要会议，特别是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这次调整的具体内容：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关系和发展速度，努力加强农业战线，适当缩短工业战线，将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扭转过来。

五年调整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坚决压缩需求。1961、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度压缩，由1960年的389亿元，压为1962年的91.3亿元。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1887万人，减少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约2600万人，1962—1965年共动员150余万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仅1961年，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普通中学的招生人数就分别压缩了27.3%、18%和23%。

2、大力调整结构。针对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中央采取了大力调整的措施，以农轻重的顺序安排生产，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1961年，国家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粮食价格提高25%、生猪26%、禽蛋类37%、油料13%，并核减粮食征购任务5%。尽可能地提高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控制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调整积累与消费比例，适当缩小基建规模，努力改善人民生活。

3、治理通货膨胀。首先，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把住货币发行口子。1960年国家财政支出654亿元，1961年陡降至367亿元，到1965年也仅为466亿元。1962—1964年3年累计净回笼货币45.7亿元。其次，冻结18类生活必需品的销售价格，实行凭票限量供应，保证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第三，放开集市价格，国家出售高价糖果、糕点和其他商品，开高价饭馆、回笼货币。当时，集市价格比国家计划价一般高出7—8倍。高价商品比计划价格也高出3—4倍。国家对农民实行“高对高”、

“低对低”的价格政策。1961—1964年，国家从出售高价商品回笼货币 50 亿元。从 1963 年起，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开始以 3—5 个百分点的速度回落，1966 年、1967 年仍保持略有下降的态势。

4、清仓核资，废物利用。“大跃进”期间盲目生产，造成一部分物资出现了较严重的积压。中央对此提出了清仓核资的号召，仅 1962 年 3 月一个月，就动员了 50 多万人对全国 30.3 万个县以上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库存物资进行了清查。对超储物资进行调剂调度，解决了生产和市场的部分急需，使定额流动资金比上年压缩 40 亿元。

5、建立和恢复各种规章制度。1961 年初，中共中央作出调整经济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规定的核心是强调集中统一。此后，中央和国务院又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以集中统一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管理制度。

从 1961 年开始，经过 5 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显著成绩。

(四) 小结：第一次经济大调整的个性特征

我国的第一次经济大波动的形成和发展，以及随后进行的经济大调整，正处在我国高度集中的单一计划经济模式时期。因此，经济大调整也具有明显的行政手段特征。

1、行政干预力量强。如上所述，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砍项目、精简职工、减少吃商品粮人口、动员上山下乡等措施，都是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来实现。此外，在商品奇缺的情况下，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牢牢地控制住，并通过开办高价商店、高价饭馆等回笼货币，且没有发生严重的倒买倒卖、哄抬物价事件，也是以行政手段做到的。

2、政治干扰较大。这次调整的原由在于经济发生了巨大困难，非进行调整不可。但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认识不足，不仅没有作彻底的批判，在某些方面